

地改種棉、桑等經濟作物；（3）多施肥料，增進地力；（4）改進水稻栽培技術；（5）推廣最佳種植制度等等。

李伯重的研究，可說為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角度。但是，如果清中葉江南地區沒有人口壓力，當代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絆腳石又會是甚麼？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Globalizing South China.* By CAROLYN CARTI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xvi, 320 pp.**

Carolyn Cartier所著*Globalizing South China*（《全球化的華南》）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叢書之一。作為一部試圖「重寫華南區域形成史」的著作，作者嘗試打破以往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的學科畛域，力求融合多樣性的世界觀。將華南「全球化」（“globalizing” south China）的意義在於，通過特定情勢下文化、政治和經濟形式的交叉去理解區域形成的複雜性；在文化綜合體和社會動態的空間聯繫所構成的長期歷史中看待區域社會的內在邏輯；將「全球化」放在空間的歷史文化實踐運作和政治經濟進程轉型的語境中去把握。作者認為，無視全球化的「全球語境」和「地區化內涵」，往往落入西方中心觀的桎梏，而無法在「世界性倫理」中體現地區化內涵；而忽視區域形成中空間聯繫的動態變換所體現的全球化涵義，則會導致20世紀80、90年代地理學及其相關領域把「地方和全球」（the local and the global）兩個概念截然對立甚至割裂開來的研究取向。本書的旨趣在於，通過華南區域形成的變異進程和地方經驗的空間實踐來理解全球化的地方性知識，又在全球化的地區社會聯繫和不平衡性中去描繪華南區域動態的表像的多層空間。將「華南」和「全球化」並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作者所引David Harvey所述，旨在憑藉重現地理學的廣闊知識來理解文明社會，打破對舊康德主義哲學中關於歷史學（敘述）和地理學（空間秩序）以及地理學（客觀物質條件的外部世界）和人類學（主觀的內部世界）這兩對二元的機械區分，重建那些在不同時空尺度下本來就互相關聯着的動態的結構過程。

全書除序言和結語外的八章分為兩大部分，前四章為華南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後四章為當代視野下的考察，每一章均融合歷史與當代材料作為區域「語境」地理（contextual geographies）的敘述脈絡。第一章開篇言明

華南歷史地理研究引發的「地理學知識商榷」，緣於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對慣行全球化話語的挑戰，差異的空間凸顯了「全球化」作為一個普遍性術語的笨拙，華南研究折射的區域視角提出了基本的地理學問題：全球化動力與地方和區域差異之間的緊張。華南區域形成的進程中產成了超邊界（transboundary）、超國界（transnational）和跨歷史（transhistorical）的特質，改革開放時期的華南成為中國歷史經濟決策的首要中心，經濟特區、經濟開放區的相繼建立和調整使區域成為明顯的次省級輻射單元，國際投資及出口轉向的發展使華南傳統的海貿前沿模式再度成為區域變遷的重大力量。以往敘述中國改革經歷慣用的「奇迹論」或者冷戰思維下的安全分析偏向，「衝擊／反應」模式或矯枉過正的「東方化」，均因缺乏語境和時空尺度而忽視相應的地理和區域歷史；另一方面，對待區域的「界定」問題，以往單純以「民族／國家」劃分空間概念造成了「疆界陷阱」（territorial trap）。「全球化」的華南研究則帶來研究觀念的轉變，它既關注行政區劃下的國家政權建設，更關注非行政區劃下跨邊界文化經濟的活動性，在新的「語境」下，「發展」成為一種取決於地區聯結進而全球網路接軌能力的進程。

關於地方、區域、空間的涵義，作者引述了Alan Pred和Doreen Massey的重要觀點——即揭示制度、人類組織及個體活動的文化實踐表徵地方身份的重要性，提出「『地方』就是社會聯繫所達到的空間」，地方作為定居之地，在社會聯繫中形成空間單位，而區域「吸納」地區即是對地區間互異而又相互影響的確認。「超邊界」的意義就在於，文化經濟的實踐通過人們高度流動性的組織和活動塑造着區域進程，人類活動對特定區域「同質」的認同表達，構成了並不清晰的非地圖化（當然，在地圖上標界區域則是另一形式的建構）的空間。

作者指出，全球化的影響是高度不平衡，全球化的地理必須通過區域化來體現，在此意義上，區域性（regionality）便是全球化進程對話的概念。著作前半部分對「華南」區域進程的考察，即是通過動態的歷程理解區域構建以及國家形成，提出歷史地理學的問題：地區發展如何反映區域轉型和全球化轉型；經濟重建中有何轉型方式；此過程會否導向集權主義和國家主義；海貿有何經濟特質。在方法論上，嘗試在跨邊界的經濟活動中調適「流動的觀念空間」、「用於定位生產和交換的地理空間」和「作為媒介和象徵意義的文化領域」三者之間的關係，從而摒棄「直線式」的歷史地理觀。

第二章講述了華南在中央王朝「開發」和推進過程中所形成的特質和變化着的表象，以及華南沿海地區的海貿傳統和信仰空間。文中引謝弗所論：

事實加上觀念意識構成了華南的特質。「南方異質」(strangeness)不僅作為一個主題,而且是作為一個「碰撞」的差異並重現在文化中。歷史上隨着經濟開發和精英南遷,漢文化也逐漸注入南方形式,對北方精英來說,「南方」所表徵的既是一個高級文化的避難所,也是一個「令事物走向錯誤」的地域。近來重寫華南史的實踐體現了區域進程的表徵,隨改革中省級權力的上升,學者們開始重思區域和國家的歷史,而歷史地理的編年史也強烈依賴於國家考古學的潛力和可能性。隨着當代考古編年愈發張揚着多元文化觀,漸漸打破了南北原有的優劣。在關於「大中華」(greater China)的討論中,作者闡明:「大中華」作為一個區域形成概念容納了重疊乃至背離的世界觀,它一定程度表徵了「全球化」這一個不能用政區進行劃界的進程。接着的第三章探討了海貿經濟與區域形成的關係,重點考察了歷史上「自然/社會」之聯繫;地區港口城市之興起;海岸及河岸田地開墾帶來的財富積累;社會組織形式如何適配長距離貿易。近代西方入侵形成的條約系統造就了華南新的商業地理,香港、上海逐漸成為兩大中心;寧波、福州、廈門雖居其次,卻有其歷史顯着特徵的延續。第四章着重關注條約港時代的華南港口城市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保持自身社會延續的程度,以及地方組織和經濟活動如何抵制條約危害等內容,在更大的世界性經濟背景中展開對華南內在特殊進程的揭示。

後四章旨在通過現代史的視野加深對以上區域歷史地理進程的理解。第五章着眼於地區文化實踐主體運動中的族群。作者圍繞馬六甲的「三保山(Bukit China)事件」考察海外華僑社會如何適應各種變革並維持獨特的群體:當地華僑的地方認同基於馬六甲地方與華南鄉土間的超越歷史的維繫、暗含於對鄭和下西洋的記憶、並暗含於禮儀化的信仰中。通過這一景觀閱讀(landscape reading),本章彰顯出三保山代表了複雜的超地方的身份認同的事實。第六章討論了區域社會進程與性別權力關係問題,特別是改革中新的經濟制度和組織所引起的女性狀況變化。通過評估一整套改革措施——如勞動、計劃生育、戶籍等——在跨邊界的文化經濟中的運作過程。第七章追蹤了改革之下土地發展過熱問題及90年代地產熱泡沫破滅的過程。最後一章則敘述香港和上海作為世界性城市崛起的現實,探討國際都會的地理和城市生活與全球化的世界主義倫理之間的深刻聯繫,從而真正把世界性城市興起這一經濟進程歷史化,並將其融入對區域政治和地理的理解中,最終作者構建出對全球化區域理解的圖景。

綜觀全書,作者刻劃的「全球化的華南」旨在對所謂的「新區域主義

(new regionalism) 」作出自身實踐和對話：將華南「全球化」即是找出經濟分析和地域範圍的單位（區域對象的基礎性），從而最適合容納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和社會進程的相互交織狀態。在方法論層面，作者明言受20世紀末英美地理學中後結構主義理論學術轉向的影響，重視空間的進程與多層性以及語境下的彈性地理（flexible geography）。作者提出，「區域空間」其實是基於理解複雜地理進程的認識論目的而提出的概念，任何完整區域系統都是虛構的。「華南」作為一個區域「範圍」其實也永遠是模糊的。《全球化的華南》啓示我們，單純將空間範圍視為區域社會進程背後的靜止「背景」，會抹殺「長時段」應有的豐富性。在聯繫和差異的空間與視野中考察區域形成的特質，同時理解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成不斷建構着多層的地域地理空間，可以擺脫將研究對象和時空「均質化」的危險，它適用於區域研究不同領域和部門的方法論辯證。或許哈特向在其《地理學性質的透視》中提出的論點並未過時：「只有在部門研究，而不在區域研究，我們才能建立明確地而客觀地劃分的區域。再則經驗表明：這樣劃分的區域在部門研究中，對決定有限數目因數之間共同變異程度是最有用的。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矛盾：我們企圖建立區域的技術概念作為區域地理研究的工具，實際上卻在部門研究中建立和應用這些概念。」【（美）R.哈特向著，黎樵譯，《地理學性質的透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37。】

謝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By FRANK DIKÖT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xvi, 441 pp.**

英國的中國史專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一書，對中國近代監獄系統的興起和發展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整理。本書是其繼中國近代種族觀念（即《近代中國的種族話語》，*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1992）和性文化（即《中國的性、文化和現代觀：民初的醫學和性認同的形成》，*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 Hurst, 1995）研究之後的又一力作，再次反映了作者在歷史研究中獨特的觀察問題的眼光和思考問題的方法。